

政治人物
精神分析
传记

罗凤礼 萧延中
主编

Revolutionary Morality

A Psychosexual Analysis of Twelve Revolutionists

革命道德

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

〔美〕威廉·H. 布兰察德 (William H. Blanchard) 著
戴长征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政治
人物
精神
分析

传记

罗凤礼 萧延中
主编

革命道德

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

〔美〕威廉·H.布兰察德 (William H. Blanchard) 著
戴长征 译



Revolutionary Morality

A
Psychosexual
Analysis
of
Twelve
Revolutionists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2002—2846

REVOLUTIONARY MORALITY

Copyright©1984 by William H. Blanchar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s granted by the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美)布兰察德著;戴长征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

ISBN 7—80109—735—1

I. 革…

II. ①布…②戴…

III. 革命—精神分析

IV. D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489 号

革命道德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2.87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内部发行)

定 价: 25.80 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政治心理研究书系

出版说明

《革命道德》并不是一部全面描写革命人物的人生和时代的作品。本书充分融合了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的研究手段,将革命问题升华为一种心理层面的冲突,力求挖掘出革命者的心理动力源泉。近年来我国已经译介了国外大量的政治心理学著作,引起了人们广泛的争论。这是首次将有关革命者的政治心理研究专著引进中国,因此,关于《革命道德》一书,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国内关于革命者个人生活及其革命经历的书籍不胜枚举,但专门以“革命”心理为主题的书并不多见。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心理传记,更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心理学著作。它将整合政治心理学体系的愿望融会进对政治人物的精神分析之中,将众多革命者串联起来,构造出了一个革命者心理发展的连续过程。本书原名为《革命道德——12位革命者的性心理分析》,考虑到作者在分析的过程中将性心理倾向加以扩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将之升华,加上革命者的心理因素远超过性心理的描述,因此我们在确定书名时更名为《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

本书作者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教授,长期以来接受心理学与历史学的双重训练,专注于研究政治心理学,尤其是革命问题,并且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卓有成就的贡献。他以革命者的人生经历为素材,详尽考察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将心理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写就了一

本立论坚实、资料丰富、内容生动的传记。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心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但对于这种分析方法学术界仍有争议。我们不能无视亨利·詹姆斯的提醒:“绝不要以为你了解人类心灵的全部秘密。”作为心理史学家,作者过多地将材料安排进预设的心理框架,对革命者的心理分析,尤其是对革命领袖的分析,也显得有失偏颇、牵强。因此书中的诸多观点及结论,我们并不表示赞同。例如,书中对马克思的心理分析并不恰当,但考虑到这部分内容在全书中所占篇幅很大,为了保持书的原貌,我们还是将关于马克思的内容作了保留。又如,作者将革命者分为四类,但是第四类“成功的革命者”(即第四部分)内容过于单薄,许多观点也有些牵强,因此我们将这一部分删去。

对于本书所涉及的心理学术语,责编基本上都进行了核对和修正,并附上了原文。为了保证图书内容的准确性和完美性,关于重要人物的言论,责编选取了名家的译文,如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均参照中央编译局最新版译文。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和线索,除了附上注释的原文书名外,书后附原书参考文献。

本书由国内心理学专家和政治学学者共同审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权威性,有助于我们了解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动向,并且为国内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是,鉴于书中涉及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且有些观点过于偏颇、牵强,因此本书确定为内部发行,特此说明。

代译序

罗凤礼

本书是“政治人物精神分析传记”译丛中的一部，之所以称之为“精神分析传记”，是因为其研究和写作应用了精神分析学说。也就是说，这类书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用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来分析传主的行为动机，因而有别于一般传统的历史名人传记，对历史名人的生平经历作出了一些新颖独到的解释。

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其核心内容是关于无意识的理论。所谓无意识，就是人的意识之外的不为主体所自觉的心理活动或行为动机。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凡提到心理活动或行为动机，往往想到的仅是人的自觉意识的活动。但弗洛伊德打破了这一局限，揭示了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存在及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根据弗氏的论述，无意识的来源或内容似可归纳为下列三点。第一，先天本能冲动，如性欲。这类因素的产生和存在既不受主体的自觉控制，又能直接或经过转化而间接地影响他的行动，成为其行为的动机。第二，后天经历或思想中令人感到羞耻或痛苦的东西，由于受到压抑而被排斥出记忆和意识。这类“故意”的遗忘似乎颇为令人迷惑，但怀疑者如果回头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比如青少年时期的)，或者听子女追忆一下他(她)的经历，看看在记忆中什么被遗忘了，什么被修正了，什么被张冠李戴似的转移了，这样便会发现，那些被修正或干脆逃离记忆或意识的内容往往是令人

感到羞耻或痛苦的。但这些离开意识的东西并未消失,它们进入了无意识,仍然会在适当的时候以某种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第三,幼儿接受父母教师等人的教诲,耳闻目睹他们的言谈举止,从中接触到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他们幼小的心灵对这些东西加以吸收内化,在自身内部形成某种行为准则,这就是弗洛伊德称之为“超我”或“良心”的心理构成部分。日常生活中任何人都可能由于行为不当而受到自己良心的责备,产生内疚感。这种内疚感的产生及活动,完全是不自觉的,是处于意识之外的,由此可见,属于良心或超我的心理活动主要是无意识的。

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无意识心理的内容多数具有性的含义或者与性欲有关,比如上述前两点的大部分即属此类。弗氏还认为,人在2—5岁的幼儿期都会产生“恋母情结”或“恋父情结”,即将父母中异性的一方作为性爱对象,而视同性的一方为情敌,对其怀有又恨又爱并混有敬畏的情感。由于弗氏论述的主要是男性,因此他重点讨论的是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在实际生活中,上述情结自然不能实现。但幼儿并不知道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界限,而往往错将思想当成行为,因此从这一情结中产生了罪恶感,并初次体验了爱与恨等复杂的情感。弗氏极为重视俄狄浦斯情结,认为它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对于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甚至给人的一生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

西方学术界普遍怀疑俄狄浦斯情结像弗氏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性意义。他们指出,幼儿与父母的关系取决于育儿方式,而育儿方式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在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各个族群之间也有差异,因此弗氏在他所处的时空条件下发现的俄狄浦斯情结不一定存在于其他的时空条件,而应该提倡根据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被完全否定。幼儿时期的抚育环境是否给人以充分的安全感,他是否得到

了充分的父母之爱,这是影响人格形成的基础条件,对此现今在理论上已很少有人怀疑,这中间自然包含着弗氏的贡献。与此同时,弗氏过分夸大性欲求在人的行为动机和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也受到批评。但他是最早对性心理作系统学术研究的严肃学者,这是公认的,他的发现也广为人们借鉴。性是人的重要本能,尽管对它的认识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但它对人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则是不可否定的。

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研究历史名人生平经历的第一人,正是弗洛伊德本人,他的小册子《莱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1910年出版)就是这样的一项尝试。由于上述弗氏的片面性以及他未能将心理分析同历史人物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虽然其努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后人指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但其具体研究结果是失败的。

应用精神分析理论成功地研究历史人物的真正宗师是埃里克·埃里克森(1902年—1994年)。他是弗氏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后来从欧洲移居美国,不仅是精神分析专家,还是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他的理论将人生分为八个阶段,即婴儿、幼儿、幼童(3—4岁)、学童、青春期、青年、成年、老年。他认为,人在每个阶段都在适应外界条件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取得新发展,具体途径是在每个发展阶段解决一个心理如何适应社会的特定矛盾,即“心理—社会危机”。人通过各阶段心理—社会危机的解决而取得逐次递进的发展,因此人生各阶段是互相连接、互相影响的,不是截然分开的。

埃里克森在人生各阶段中最为重视的是青春期和青年期。他认为,人在此时期要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即要弄清楚“我是怎样的人”,从而确认自我身份。他如坚信自己由已往的发展所形成的自我同别人和外界对他的看法相一致,那便顺利形成了自我身份

认同；但如果个人遭遇不幸或逢社会混乱，青少年就可能陷入精神迷惘，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应该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发生了“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但这种危机在埃里克森看来有时不是坏事。他指出：过去，一些意识形态的革新家从他们自己拖长了的反反复复的青春期的冲突中，引出了充满活力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新要素，因而推动了整个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埃氏的名著《青年路德》便是此种理论的具体运用，它阐释了年轻的路德如何在解决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同时找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因而成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埃里克森不仅修正了弗氏片面强调童年经历的作法，而且能够自觉地将人物的心理问题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因此他研究历史名人的著作能够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欢迎。

埃氏上述理论观点所涉及的自然主要属于无意识范畴。那么无意识究竟如何影响甚至有时控制人的行为呢？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仅精神分析界存在不同派别，而且即使基本观点相同的不同精神分析学家对同一个心理现象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这也是个很难用空泛议论来加以概括的问题，而需要在实际案例中加以具体的探讨。

本书以精神分析理论为指导，简要考察了一批社会反叛者或革命者的思想行为。作者指出，这些反叛者或革命者虽然具有不同的思想信仰和政治倾向，主张行动的方式也不同（如有的主张暴力反抗而有的主张非暴力反抗），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寻求一种道德真理并渴望个人之善，同时坚信这种个人之善只有在为别人受难中才能获得”。为达到个人之善并建立新的社会道德而甘愿“受难”吃苦甚至牺牲自己的这种倾向，在作者看来，就是一种受虐心理。因此作者认为，其重要的一个动力便是心理上的受虐冲动，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不仅毫不退缩，而且能够从失败

的挫折和屈辱中感受到欣慰和快乐。而根据弗洛伊德学说,这种受虐心理归根结底是性受虐狂的转移和升华。

至于作者根据上述理论观点对历史人物所作的分析和描述是否成功,是否令人信服,这固然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其结论恐怕只能由诸位读者自己作出。不过为了不误解作者的全面理论观点,似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作者所重点描述的作为人的行为动力的受虐冲动当然主要是无意识的,但同时他并未忽略有意识层面上的“理性”同样是革命者的行为动力,他明确地说:“理性在革命者的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第二,他并不认为受虐冲动是其笔下人物行为的惟一动力,而是认为所有人类行动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样,不管其实践研究的结果如何,作者起码在理论上避免了片面性,这是值得赞赏和借鉴的。

最后,我与本丛书另一位主编萧延中先生对本书译者表示感谢,他面对许多文字上和内容上的难解之谜,付出了大量心血,实在难能可贵。我们还要感谢为出版本书而在幕后辛勤工作的编辑们,她们认真审阅译稿,校正错讹,拾遗补阙,表现了可贵的敬业精神。我们向她们深致敬意。

前 言

本书代表了我 15 年来研究革命和政治心理问题的最终成就。这项研究始于我的一本早期著作《卢梭和叛逆精神》，它是一项有关卢梭政治观点起源的心理学研究。此书 1967 年由密执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这本书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它广泛考察了针对国家的反叛或起义背后的主要心理因素。这一考察是在如下的假设下进行的，即这类起义是基于某些旨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生活的道德原则和理论之上的。我将宫廷和军事政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因为这样的政变只涉及统治派别的变动，或者只是以一位领袖替换另一位领袖，而不包含社会的基本变动。

本书的鲜明特征是，它把众多不同来源的革命意识形态和策略放在了一起，其中有些相互之间似乎是直接对立的（例如暴力与非暴力），却又在反抗既存国家权威的冲动方面表现出共同的心理动机。我把道德反叛作为研究的首要主题，这是一个理论家和实践家、暴力者和非暴力者、甚至叛逆者和革命者共同拥有的特点。

反叛者总是在口头上或行动上以抗议的形式反对国家。反叛者是否会成为革命者取决于他自己所处的形势怎样。诸如大众对他的观点和主张的接受程度，国家针对他所使用的暴力的程度，他在自己的组织中所受到的挑战和竞争，在何种程度上他感到有必要用行动证明对自己和他人的忠诚（以表明他不仅仅是国家的工具，显示他愿意为高尚的事业挺身冒险），这些都会对他成为一位

革命者形成影响。

长期以来,我一直感到在革命者的行为中有着共同的心理特征,但我从来就不认为这种特征是简单的或是容易描述的。一些革命者与另一些革命者的行为之间的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们显得似乎毫无联系。卡尔·马克思,这位暴力的激烈鼓吹者,这位为自己的破坏形象而尤其感到高兴并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看来一开始就与那位温和的圣人莫罕达斯·甘地毫无共同点。卢梭,这位力求遁世并易在社会场合中胆怯的孤寂的思想家,在气质和秉性上明显不同于那位活动家、游击队战士和人民的领袖切·格瓦拉。甚至马克思和格瓦拉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二人都是暴力的鼓吹者,但马克思似乎满足于以包含崇高理想和智慧观点的精致理论模式来鼓吹暴力。相反,格瓦拉基本上是一位行动家,虽然他留下了大量关于游击战和革命自觉性的作品,但为他赢得最大名声的是他所做的事,而不是他所写的书。

我相信这些人物和本书所要考察的其他人的行为背后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自我观念,一种共同的道德态度。在《革命者的人格》(*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一书中,维克多·沃尔夫恩斯坦(Victor Wolfenstein)指出,他的三个研究对象(甘地、托洛茨基和列宁)每个人都背负着内疚,这种内疚的负重是他们在家庭关系中所无法摆脱的,他们每个人都难以解决与父亲权威相冲突的难题。沃尔夫恩斯坦将这些看做是卷入革命之中所必要的但并非充分的条件。布鲁斯·马兹里希(Bruce Mazlish)在《革命苦行者》(*The Revolutionary Ascetic*)一书中描写了一种“典型的革命人格”。革命苦行者的重要特征是与情欲联系较少,具有施虐—受虐倾向,以及通过自我否定和受难达到胜过他人的能力。

我早期对卢梭的研究描绘了类似的特征,然而我强调了在传统的精神分析意义上受虐倾向的作用,即肉欲和道德激动因受难

而产生,而不是因为苦行主义的禁欲满足。我同时也强调了作为孩子的卢梭表现出的吸引别人注意的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了作为成人的他有着某种展示他对群众的爱和被群众所爱的需要。或许我的研究与马兹里希著作之间的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在于,我努力按照从最初的道德受虐狂者到成功的革命者的顺序,将革命者置于四个阶段的连续发展过程中。

如果我们承认性受虐狂者和事业殉道者这两者能在受难中获得共同的乐趣的话,那么我们在对反叛现象的理解上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卢梭童年时期崇拜的是那位将手伸向喷着熊熊火焰的火盆以展示他承受痛苦的能力的英雄斯凯沃拉(Scaevola)。而马克思童年时期崇拜的英雄是那位为人类盗火,但却因自己的英勇行为而被用锁链锁在岩石上遭受苦难,并有一只鹰一片一片地啄食他的肝脏的挑衅者普罗米修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时,我们就能将狂勇的马克思和胆怯的卢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托尔斯泰的一位姑姑也崇拜斯凯沃拉,而这位姑姑对托尔斯泰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切·格瓦拉童年时期崇拜的英雄是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抗拒的是无法抗拒的形势,而这种形势也正是格瓦拉在他最后的战斗中所面对的。在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格瓦拉写道,“我又一次触到了胯下罗西南特(堂吉诃德的战马)的肋骨”。

然而,在寻求私有的、隐秘的、高度个人性快乐的明显的性受虐狂者与为人类而受难的政治救世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区别。卢梭在11岁时因被打屁股而激起了性欲,而劳伦斯则雇了一名中士抽打他,以使他达到性高潮,但他们两人都曾在一生中的不同时期里设法转化这些性欲,并在更大的、更富有政治性的意义上去为他人的自由而受苦。寻求一种道德真理并渴望个人之善,同时坚信这种个人之善只有在为别人受难中才能获得,这是我们将要研究的反叛者的一个基本特点。

马兹里希也强调了革命动机的道德层面，以及它与宗教理想主义的密切关系。而我在研究中要阐明的正是这种道德层面。我曾考察过那些洞察到社会中缺乏公正并对此现象提出抗议的人的动机。我们之中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敏锐地感觉到这种社会公正的缺乏或者被这种缺乏激起同样程度的道德愤慨。这种道德愤慨的个人来源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一个人如此认同于被压迫群体，从而使他感到必须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些事情？这些正是我试图回答的问题。

致 谢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产生于1968年一次与迪克·多克特(Dick Doctor)的谈话。当时多克特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他提出让我教授革命心理学课程,并给我以鼓励。自此,我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加利福尼亚职业心理学研究院为同样的课程准备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的讲稿。与此同时,我还作为南加州大学的教员在四年时间里举办了一批讲座,讲授这一课程。在此期间,我与杰拉德·雪莱(Gerald Shure)、迈尔瑞·罗斯(Meryl Ruoss)以及特利·库伯(Terry Cooper)就本书的某些观点所进行的讨论使我获益良多。特别要感谢计划分析与研究学会的主任和全体成员,过去五年间我一直是该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在此我向曾花时间仔细通读了全部手稿并使前言和导论得以强化的伊莉莎白·帕利·凯滕娜西奥(Elizabeth Parry Catenaccio)表示衷心感谢。罗伊德·穆特(Lloyd Moote)提出的意见对本书,特别是对于全书的组织和结构有巨大帮助。最主要的支持来自于我的妻子哈切伊(Hitchie),她对于这一研究抱有很高的热情,欣然阅读了手稿的几个不同版本并提出了批评,从而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如果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便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导 论

政治活动的心理基础

我对把自由民主当成是克服专制最有效手段的看法持有根本的怀疑。无疑,我们大多数人都情愿生活在一个由理性的、人道的、相信政治自由的人们管理着的社会之中。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些管理者就是最先察觉到民主的滥用和最先对这种滥用作出反应的人。在其研究著作《独裁主义者的性格》一书中,阿多尔诺等人声称自由民主和专制是两极对立的。^①这一研究截至目前已引起太多的批评,这里无法尽述,但是我并不怀疑这一研究得出的基本发现——在极端专制主义和施虐—受虐狂之间存在着联系。我的疑问在于“健康理性的”自由是“病态的”专制的克星这一结论本身。事实上,比自由主义噪音更亮的、更积极活跃的是那种顽强的抗议者,他所起的作用就像是一只总是叮在国家这层牛皮之上的牛虻。他一刻也不停地斥责着特权和不公,即使是在一个多数人都感到相当满意的民主国度里,也是如此。如果警察禁止在主要街道上游行,但提出允许在一条小街道上游行作为妥协,他就会加以拒绝,从而诱使警察逮捕他。他很少服从社会加以确认的道理。不管其主要职业是律师、演员、商人或者学生,他同时还